

浙江民间金融研究述评

朱海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要】浙江民间金融一直是学术界颇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民间金融发展，更是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此文以近三十年来国内外浙江民间金融研究中公开发表出版的论著为分析对象，从浙江民间金融与经济发展、浙江民间金融组织、浙江民间金融制度与历史、浙江民间金融问题与监管四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与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外浙江民间金融研究进行了总体评析。

【关键词】浙江；民间金融；创新发展

【DOI 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2.026

【中图分类号】F830.39（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6）02-0138-06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迅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浙江民间金融也迅速恢复、发展，浙江民间金融因总量巨大且异常活跃，其动向一直是国内经济金融界关注的焦点。浙江民间金融与浙江经济发展高度融合，与浙江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历史习俗、人文环境高度契合，具有典型的内生性。与“苏南模式”的地方政府支持型民间金融和广东海外融资型民间金融相比，浙江民间金融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对外依赖性小，独立性强，市场行政干预相对较少，更具生命力与活力。^①

国内外许多学者和专家对改革开放之后浙江民间金融发展作了不少有益探索，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浙江民间金融的专题研究还没有形成一套具有指引意义的、系统的参考文献，笔者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所藏文献和中国知网电子资源，将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关于浙江民间金融研究的专题成果进行了系统整理，从浙江民间金融与经济发展、浙江民间金融组织、浙江民间金融制度与历史、浙江民间金融问题与监管四个方面进行文献分类、梳理与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外浙江民间金融研究进行了总体性评论。^②

1 浙江民间金融与经济发展

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因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干预，金融发展受到抑制，企业外源融资难，内源融资成为主导，揭示了民间金融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有关浙江民间金融产生、发展研究的成果，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佐证了上述观点。史晋川认为浙江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是当地经济市场化的结果，而民间金融仍处于被压制状态，改善其制度环境，才可能实现民间金融的良性发展。[1]金雪军认为民营性就是浙江金融重要特征之一。[2]胡一荆在考察温州民间金融的基础上，认为民间金融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温州民间金融对其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为此我国现阶段应尽快建立健全民间金融制度和体系。[3]程蕾采用温州的数据和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民间金融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作用，她认为民间金融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继续存在，但已有萎缩的趋势。[4]

1993年，King & Levine 的著名文章“Finance and Growth”发表，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引发

关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师 Kellee S. Tsai 专门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非正式金融对中国私营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5]在此基础上,Kellee S. Tsai 与王晓毅、李人庆合作,进一步分析了温州民间金融与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关系,认为民间金融还未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6]郭斌以温州为例对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互动关系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他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政府需要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演化为规范化运作的、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营金融机构,建立多元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7]Luigi Guiso 认为地方金融发展水平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中国东部省份的金融市场化相对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省份;东部与中西部的金融市场化差距还在扩大。[8]Allen 等认为中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合理的解释是巨大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分析了温州非正规金融部门运行机制:基于关系和声誉的非正式金融,也就是说,家庭成员和朋友、生意上的伙伴、以及标会、地下钱庄等通常成为温州民营企业的融资对象。[9]蒲祖河从金融的角度,对温州与苏南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他认为民间金融对温州产业结构的作用相对不足,并就温州区域产业和民间金融的融合提出了建议。[10]姚耀军、陈德付的实证分析表明,温州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走势,与正规金融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直接相关,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与中小企业信贷水平之间不是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11]虞群娥以杭州为例,论证了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存在很强的共生性关系,认为这种共生关系是中小企业、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三类市场主体博弈的均衡结果,是现有制度条件下的理性选择。[12]邢震认为非正规金融拓宽了台州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其优势是有效解决了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因此成为中小企业的理性融资选择。[13]李玉以温州金融改革为背景,运用共生理论剖析了民间金融的共生机理及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探讨了温州金融改革对民间金融规范发展的推动作用,认为在推进民间金融健康发展时应遵循共生规律。[14]

2 浙江民间金融组织

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斯认为:组织及有效率的制度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浙江民间金融研究中,民间金融组织研究占有重要地位。

对浙江典当业的研究。翁国华对义乌以寄售店形式出现的“当铺”进行了全面调查,认为民间“当铺”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由于它当时还处于不受约束的盲目发展阶段,故存在大量不安定因素。[15]范李通过对嘉兴市典当行业的调研分析,揭示了典当行业在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风险,并提出了对策建议。[16]

对早期浙江信用社和对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研究。史晋川以浙江路桥信用社为例进行分析,认为在国有专业银行陷入困境,而以民资为主的路桥信用社迅速崛起,其深层次原因是金融管制的进一步放松和金融自由化的加深,认为减少政府直接干预,是真正能够促进民间金融业发展和金融深化的正确举措。[17]林恩伟通过考察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行现状、制度环境及存在的缺陷,从外部制度和内部环境两方面进行剖析,认为实现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完善其内外相关制度。[18]

对浙江标会、合会的研究。胡必亮在对温州一个村庄的标会进行详尽调查的基础上,将村庄非正式金融发展现实与村庄共同体理论及信任理论相结合,认为“村庄信任”是标会存在的重要基础,也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19]郑振龙、林海根据标会的内在机制分析了标会参与者的现金流特征,提出了运用折扣率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研究标会参与者盈亏状况的模型和估计标会利率期限结构的模型。[20]张翔、邹传伟以温州春风镇标会会案为例,剖析了标会会员参会、得会和组会行为,对会员是否存在信息隐瞒行为做了实证检验,[21]并运用分析工具,揭示了标会存在套利、利率升高及标会违约预期等现象,进而提出了处理和控制在标会系统性违约风险的政策建议。[22]

对浙江互联网金融的研究。董仁涛考察分析了淘宝网所采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方式——支付宝,并针对一些支付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23]沈利军、徐伟认为支付宝欠缺合法主体资质,该虚拟账户支付模式的具体服务内容不合法,建议将该支付模式纳入电子货币的范畴进行监管。[24]陈曲、林铠燊以支付宝为例,提出了完善第三方支付跨境服务的构想。[25]邱勋考察了余额宝的创新业务及其对商业银行超短期理财产品、活期存款和基金等造成的影响。[26]曾毅、王晓丽对余额宝引发的欠缺销售基金资格等诸多法律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如何进行跨界监管是监管部门面临的新问题,必须尽快完善网络立法。[27]王天宇

剖析了余额宝运作模式及其对我国传统金融行业可能会造成的影响。[28]

3 浙江民间金融制度与历史

新经济史的开拓者诺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历史文化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金融制度、历史也是民间金融研究的重要选题。蒲祖河、杨志敏以温州为个案对民间金融的制度性变迁与创新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温州民营中小企业的不断发展，对民间金融的依赖性强，认为政府要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融资问题，在政策选择上应当逐步实施金融自由化，引导民间金融规范化运作。[29] 崔婷、朱久霞认为民间资本缓解了企业资金压力，但是利息高昂又迫使温州企业频现老板“跑路”，提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须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确定民间借贷合法地位。[30] 朱海就、林小文结合温州金融发展的历史，论证了正是政府的过度管制，制约了民间金融制度的发育。[31] 肖世杰通过对吴英非法集资案进行分析，认为民间金融监管困局是因为立法没能尊重真实社会的具体诉求而使之沦为无人信仰的法律，而破局之策在于改革现有僵化的金融体制，逐步推进民间金融利率的市场化和合理化。[32]

浙江民间金融史研究。陈国强主编的《浙江金融史》（1949—1999），全面论述了 1949 年至 1999 年的浙江金融状况，涉及改革开放内容主要有三章：第五章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浙江金融工作（1977—1984）；第六章 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浙江金融工作（1984—1993）；第七章 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的浙江金融工作（1994—1999）。目前，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金融发展最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33] 一些志书，如《杭州金融志》、《宁波金融志》、《温州金融志》、《绍兴金融志》等对当地金融进行了全面介绍。但上述著作的主要内容多为正规金融，民间金融的内容则极少，仅《浙江金融史》（1949—1999）中对改革开放初期几个浙江民间金融组织作了简要介绍。1996—2013 年的《浙江金融年鉴》，这些《浙江金融年鉴》为我们了解浙江金融发展概况提供了详细的统计资料。[34] 张震宇、毛春华则对改革开放之后的温州钱庄、典当、民间借贷等金融现象和金融体制改革进行了系统总结，阐述了金融形势的历史性变化。[35] 诸葛隽所著的《民间金融——基于温州的探索》，依照时间顺序，对温州民间金融组织发展作了详细介绍，并对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但对温州民间金融问题所作探讨，则主要从经济金融学的角度展开的。[36]

4 浙江民间金融的问题与监管

浙江民间金融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民间借贷方面。张震宇、毛春华认为浙江民间借贷利率的升降与国家正规金融信贷规模的增减直接相关。[37] 规范的金融模型解释最早归功于张军，他提出了温州民间金融中利率决定的解释，他还以温州为案例，探究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特征及演进背景，阐释了民间的高利率所具有的筛选功能，对传统的“高利贷”理论提出了挑战。[38]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在对浙江民间金融现状、问题调研分析的基础上，阐释了其运行机理和对货币政策影响，提出了分类引导、规范浙江民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39] 蒲祖河对温州民间资本中介化配置效率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分析，指出温州民间资本配置的低效率已日益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大因素，认为中介化是提高民间资本配置效率的有效机制；[40] 他还以温州为例，对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市场中的不同借贷主体具有一定的异质性，我国区域二元金融结构具有合理性。[41] 叶茜茜对近 30 年来温州民间金融利率波动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民间金融比正规金融的利率机制更为有效，能够按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发挥调节作用，但也具有一些负面效应。[42]

对浙江民间金融的风险监测与防范研究。温州地区民间借贷监测点数据完备，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蔡灵跃结合民间借贷监测点的资料，对温州民间借贷进行了分类和结构分析，揭示了不同的民间借贷类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状态、成因和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43] 吴国联利用温州近 1 000 家融资中介的 1 300 多个银行账户为样本，形成了温州市民间借贷交易活跃指数监测数据，其研究结果表明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总体呈增加态势。[44] 周松山从温州原有民间借贷监测样本积累数据及实际经验入手，分析了温州民间借贷的现状、发展特征，以及民间借贷监测制度面临的难点，提出了完善民间借贷利率监测体系的建议。[45] 吴伟萍等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提出完善民间借贷风险管理，一方面要对民间借贷加强立法监管及规范借贷主体行为，另一方面要完善正规金融服务，降低民间借贷的规模，[46]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民间借贷规范化管理的

5 总体性评价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间金融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浙江民间金融研究紧跟金融理论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呈现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间金融研究，运用的主要理论为金融发展理论、③金融抑制理论。伴随着浙江民间金融研究逐步深入，金融理论的持续发展，区域金融理论、演化经济学以及金融地理学等理论被引入，并在这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逐步衍生出区域金融生态、政治与区域金融发展、文化与区域金融发展等新领域。

其次，浙江民间金融研究呈现出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近三十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浙江民间金融研究在原有的以民间借贷、利率为研究主线的基础上，研究内容不断深入，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从浙江民间金融制度到民间金融监管，从浙江非法集资到民间金融阳光化、规范化，从浙江民间金融组织的演变到温州老板“跑路”、“余额宝”等，均有专文或论著涉猎。

再次，学者们以金融学为基础，与管理学、法学、统计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相结合，既从宏观上探讨了浙江民间金融的整体发展状况，又在中观、微观层面深入剖析了浙江民间金融的利率结构及合会、典当、支付宝等金融组织，对于浙江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的关系特别重视。从研究方法看，受西方金融学研究的影响，运用西方经济金融理论的实证分析类成果已成主流。

浙江民间金融研究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毋庸讳言，其中依然有不少缺憾，主要表现在：（1）已有文献主要是从经济金融学角度开展研究，多为实证分析和描述性的研究成果，理论模型分析少。虽然多数研究有数据支撑，但是对数据的挖掘筛选及数据的考订较为欠缺，因而很多数据之间差异较大，导致即使研究同一问题，研究结论也差异很大；而研究角度不同的文献，其结论往往分歧更大。很多成果是纯粹的经济金融研究，没有把研究对象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对民间金融与地缘特性、时间因素、人性情理的关系研究重视不够，因而在资料运用上，对一些重要的资料报刊如《浙江金融年鉴》、《浙江日报》、《温州日报》、《杭州日报》等都缺乏有效使用，无法了解民间金融的运作实况，衡量其在金融界的作用，及其对政治、社会、司法等之影响。

已有研究涉及到了浙江民间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行了深入探讨，但也有一些基础性的重要问题并未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比如：民间金融的利率水平与正规金融利率水平的长期关系、民间金融自身的风险规避机制等；浙江与其他区域民间金融的深层次比较研究也较为欠缺。已有文献虽然研究的时间跨度从改革开放初期至当今，成果也不少，但多为具体的浙江民间金融现象或金融经济关系的研究，并集中于浙江民间借贷及利率方面的研究，总体观之，难以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间金融的动态发展与整体概貌。（2）已有成果主要是从自上而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角度，即政府制度供给的角度考察浙江民间金融制度发展，而浙江民间金融制度内生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则鲜有看到。已有浙江民间金融制度的研究，多侧重为具体的对策，缺乏对浙江民间金融制度沿革与演变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且理论深度不够，对于民间金融在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以及金融体制改革中的巨大参考意义重视不够，没有将民间金融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安排进行深入研究、挖掘。浙江民间金融组织的相关研究成果，论及了浙江民间金融的主要组织形式，对较早成立的民间金融组织研究相对深入，但对那些社会影响力小的民间金融组织的研究极少，如：浙江的合作基金会、资金互助会等民间金融组织的系统研究明显不足；对浙江民间互联网金融等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新兴金融组织的研究，则增长很快，但有分量的成果很少。（3）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间金融史的研究还停留在较浅的层次，主要的成果均是资料整理与汇编，缺乏对已有汇编整理资料的深入细致地研究性成果，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间金融发展的系统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民间金融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创新不够。金融史属交叉学科，研究中需综合运用金融学和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要求研究

者既要有金融学的功底又要有历史学的基础。一些出身于史学界的民间金融史研究者不注意运用现代金融学理论与方法，使得其研究结论缺乏理论深度；而出身于经济金融学界的金融史研究者，史料搜集与考证功夫往往欠缺，也不重视历史资料的解析，喜欢简单套用经济学、金融学理论模糊处理，有“削足适履”之嫌。（4）从浙江民间金融研究的地域看，研究温州民间金融的成果最多，其数量远远超过浙江其他地区民间金融研究，其次为台州、杭州、嘉兴和丽水地区，而浙江其他地区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扎堆研究温州民间金融，加之一些学者对学术动态关注不够，故也造成了某些研究的低水平重复。（5）国外与浙江民间金融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极少。国外在金融发展理论、金融抑制理论、区域金融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国内学者在开展浙江民间金融研究时，对国外的金融理论引用率较高，但一些学者对国外金融理论的理解并不准确全面，因而也出现了“食洋不化”或“片面引用”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史晋川. 制度扭曲环境中的金融安排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1, (1): 63-68.
- [2] 金雪军. 关于浙江金融现象的思考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3, (3): 30-34.
- [3] 胡一荊. 民间金融与地方经济发展——温州融资模式的启示 [J]. 南方经济, 2003, (3): 62-65.
- [4] 程蕾. 民间金融实证研究——以温州为例 [J]. 财贸经济, 2004, (2): 39-42.
- [5] Kellee Tsai. Beyond Banks: The Local Logic of Informal Finance And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China.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o be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Financial Sector Reform in China, 2001.
- [6] 王晓毅, Kellee S. Tsai, 李人庆. 农村工业化与民间金融: 温州的经验 [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4.
- [7] 郭斌, 刘曼路. 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发展: 对温州的实证分析 [J]. 经济研究, 2002, (10): 40-46.
- [8] Luigi Guiso, Paola Sapienza, Luigi Zingales. Does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tter? NBER Working Paper No. 8923, 2002.
- [9] Allen, F. J. Qian, M. J. Qian.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7: 57-116, 2005.
- [10] 蒲祖河. 民间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温州与苏南产业发展模式的金融视角比较 [J]. 温州大学学报, 2005, (4): 25-30.
- [11] 姚耀军, 陈德付.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 理论及其实证研究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5, (8): 45-51.
- [12] 虞群娥. 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共生性的实证分析——杭州案例 [J]. 金融研究, 2007, (12): 215-222.
- [13] 邢震. 非正规金融: 中小企业融资的合理选择——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 [J]. 吉林工商学院学报, 2009, (5): 35-38.

-
- [14] 李玉, 王吉恒. 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兼论温州金融改革 [J]. 商业研究, 2013, (2): 161-165.
- [15] 翁国华, 陈一玲. 对义乌市寄售店开办典当业务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J]. 浙江金融, 1996, (3): 18-19.
- [16] 范李. 对嘉兴市典当行业发展状况的调查分析 [J]. 上海金融, 2010 (3): 94-95.
- [17] 史晋川, 孙福国, 严谷军. 市场深化中民间金融业的兴起——以浙江路桥城市信用社为例 [J]. 经济研究, 1997, (12): 46-51.
- [18] 林恩伟. 论小额贷款公司运行: 制度环境与完善——以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运行现状为分析视角 [J]. 上海商学院学报, 2010, (3): 44-48.
- [19] 胡必亮. 村庄信任与标会 [J]. 经济研究, 2004, (10): 115-125.
- [20] 郑振龙, 林海. 民间金融的利率期限结构和风险分析: 来自标会的检验 [J]. 金融研究, 2005, (4): 133-143.
- [21] 张翔, 邹传伟. 信息隐瞒、信息甄别和标会会案——以春风镇标会会案为例 [J]. 金融研究, 2009, (12): 109-126.
- [22] 邹传伟, 张翔. 标会套利和系统性标会违约——对温州市春风镇标会会案的实证分析 [J]. 金融研究, 2011, (9): 192-206.
- [23] 董仁涛. 支付宝:从淘宝网看电子商务支付方式 [J]. 商场现代化, 2004, (2): 133.
- [24] 沈利军, 徐伟. 支付宝虚拟账户支付的法律分析及规制 [J]. 金融与经济, 2009, (6): 68-70.
- [25] 陈曲, 林铠燊. 第三方支付企业跨境发展初探——以支付宝为例 [J]. 特区经济, 2013, (9): 208-210.
- [26] 邱勋. 余额宝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和启示 [J]. 新金融, 2013, (9): 50-54.
- [27] 曾毅, 王晓丽. “余额宝”引发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J]. 金融与经济, 2013, (12): 73-76.
- [28] 王天宇. 浅析“余额宝”对我国金融行业的影响 [J]. 中国商贸, 2014, (1): 132-133.
- [29] 蒲祖河, 杨志敏. 民间金融的制度性变迁与创新研究——对温州个案的实证分析 [J]. 温州大学学报, 2003, (6): 1-6.
- [30] 崔婷, 朱久霞. 从温州民间借贷事件看中小企业融资 [J]. 会计之友, 2012, (15): 86-87.
- [31] 朱海就, 林小文. 从金融制度视角探析温州民间金融发展迟缓的深层原因 [J]. 浙江金融, 2012, (11): 26-27.
- [32] 肖世杰. 从吴英案看我国民间金融的监管困局与改革路径 [J]. 法学论坛, 2012, (6): 92-101.
- [33] 陈国强. 浙江金融史 (1949-1999)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 [34] 浙江金融年鉴编辑委员会. 浙江金融年鉴 (1996-2012)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2013.
- [35] [37] 张震宇, 毛春华. 温州金融现象透视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3.
- [36] 诸葛隽. 民间金融——基于温州的探索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
- [38] 张军. 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 温州案例 [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香港), 1997, (20): 10-20.
- [39]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浙江省民间金融研究报告 [J]. 浙江金融研究报告, 2006, (1) (内部资料).
- [40] 蒲祖河. 中介化——提高民间资本配置效率的有效方法 [J]. 财贸经济, 2005, (5): 28-30.
- [41] 蒲祖河. 基于温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结构现状的博弈分析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7, (3): 82-85.
- [42] 叶茜茜. 影响民间金融利率波动因素分析——以温州为例 [J]. 经济学家, 2011, (5): 66-73.
- [43] 蔡灵跃. 对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类型分析及对策建议 [J]. 浙江金融, 2007, (1): 26-27.
- [44] 吴国联. 对当前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调查 [J]. 浙江金融, 2011, (8): 25-27.
- [45] 周松山. 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变动影响因素及其监测体系重构研究 [J]. 浙江金融, 2011, (1): 15-20.
- [46] 吴伟萍, 吴杰. 我国民间借贷风险管理问题研究——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 [J]. 经济纵横, 2010, (8): 79-82.
- [47] 吴伟萍, 张衍骏. 台州民间借贷如何规范化发展 [J]. 经济导刊, 2011, (2): 92-93.

作者简介: 朱海城 (1973-), 男, 河南信阳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副教授。

①浙江民间金融是国内典型的民间金融形态, 属自由市场型民间金融, 其与浙江民营经济相伴生, 政府干预少, 民间金融与经济发展契合度高, 更具原始金融的本义; 广东的民间金融是海外融资型民间金融, 其金融资本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地区, 具有典型的外向型特点, 与广东的产业融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 “苏南模式”的地方政府支持型民间金融, 当地政府强力介入, 推动企业融资与经济发展, 具有典型的政府干预特点。

②目前, 在中国民间金融研究领域, 涉及浙江民间金融的综合类研究成果并不少见, 但这类综合研究, 通常是把浙江或浙江的某一个地区, 放在全国范围内一起考察, 研究内容庞杂, 涉及面广, 对浙江民间金融的研究往往不够深入。限于篇幅与研究需要, 本文所引文献多为浙江民间金融的专题研究。

③该理论的创始人是 Goldsmith (1969), 其金融结构理论揭示了金融结构变化, 金融相关比率的变化趋势,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 20 世纪 70 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 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King 和 Levine (1993) 的论文在 Goldsmith 的研究基础上, 进一步论证各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所期望的正相关关系。此后, 金融发展理论虽未停滞, 但未有实质性发展。